

引用格式:王兆峰,李琴. 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高质量发展[J]. 山地学报,2022,40(4):581-596.

WANG Zhaofeng, LI Qi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gh-quality tourism development along the Long March [J]. Mountain Research, 2022, 40(4):581-596.

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 及旅游高质量发展

王兆峰,李 琴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摘 要: 长征沿线基本是农村连片贫困区,合理利用长征文化遗产资源发展红色旅游是有效衔接区域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系统地探究长征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且欠缺长征主题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的定量化研究,不利于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开发利用。本研究以长征直接相关的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样本,并将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与 A 级景区名录进行逐一对照,首先运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探索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次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辨识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密度核心区为黔东南地区、湘西地区、川黔地区和陕北地区,且空间分布具有沿着大娄山、夹金山、乌江、赤水、大渡河等地理带状区域集中的趋势。(2)省域层面上,各省市数量差距较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贵州、四川、湖南、陕西和甘肃五省。市域层面上,仅占地级单元数 6.18% (排名前十位的地级市)的地级市拥有区域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 52.47%。(3)目前 791 个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仅有 49 个被开发为高质量旅游景区。市域尺度上,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长征遗产资源、自然资源、交通条件、相关政策是影响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强作用力因子。本研究可为长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的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长征;红色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 F592.99

文献标志码: A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沿途留下的大量遗址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形成的长征精神、长征文化是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历史军事主题事件的线性文化遗产,长征文化遗产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亟需从整体视角系统探究其空间分布格局,以期整体把握长征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同时,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文旅融合成为战略安排和时代要求,为长征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提供了新契机。探究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旅游高质量发展现状及其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对于优化长征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红色文化遗产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国外没有红色文化遗产这一说法。国外学者主要围绕战争遗址、纪念地、革命旧址等历史文化遗产展开研究,研究内容聚焦于旅游开发^[1-2]、法规建设^[3]、保护性研究^[4-5]等方面。国内对于红色文化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晚,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1)红色文化遗产整合开发^[6-7],研究认为应整合区域相关旅游资源,将革命文物与山水风光、历史文化有机整合开发。(2)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8-13],即从景观设计学^[14]、地方立法^[15]、数字

收稿日期(Received date):2021-08-09;改回日期(Accepted date):2022-07-29

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80)。[Major Projec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21ZDA080)]

作者简介(Biography):王兆峰(1965-),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地理与旅游管理。[WANG Zhaofeng (1965-), male, Ph. D., professor, research on tourism geograph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E-mail: jdwzf@126.com

化^[16]等方面探讨了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利用路径。(3)旅游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18-21],旅游开发是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重要方式,一些学者认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可以推动旅游开发,旅游开发可以促进红色文化遗产保护^[19]。研究尺度覆盖区域^[7, 22]、省域^[23]、市域^[24]等多个层次。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视角上,学者多从历史学、旅游学、景观设计学等角度对红色文化遗产展开研究,而从地理学视角对红色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并不多见。(2)研究内容上,系统探索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且欠缺长征主题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的定量化研究,不利于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开发利用。

本研究以长征直接相关的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样本,运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探索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将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与 A 级旅游景区名录进行

逐一对照,解析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设现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辨识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以期对长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高质量旅游景区的空间优化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征沿线地区包括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云南、四川、青海、甘肃、陕西、重庆、宁夏 15 个省市区,总面积约 383.17 万 km²。该区域包含多个少数民族杂居区或聚居区,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地势起伏较大。同时,长征线路沿线基本是农村连片贫困区,涉及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地区、罗霄山区和四川藏区 7 个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长征沿线包含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合理利用长征遗产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带动区域脱贫已成为长征沿线地区社会各界的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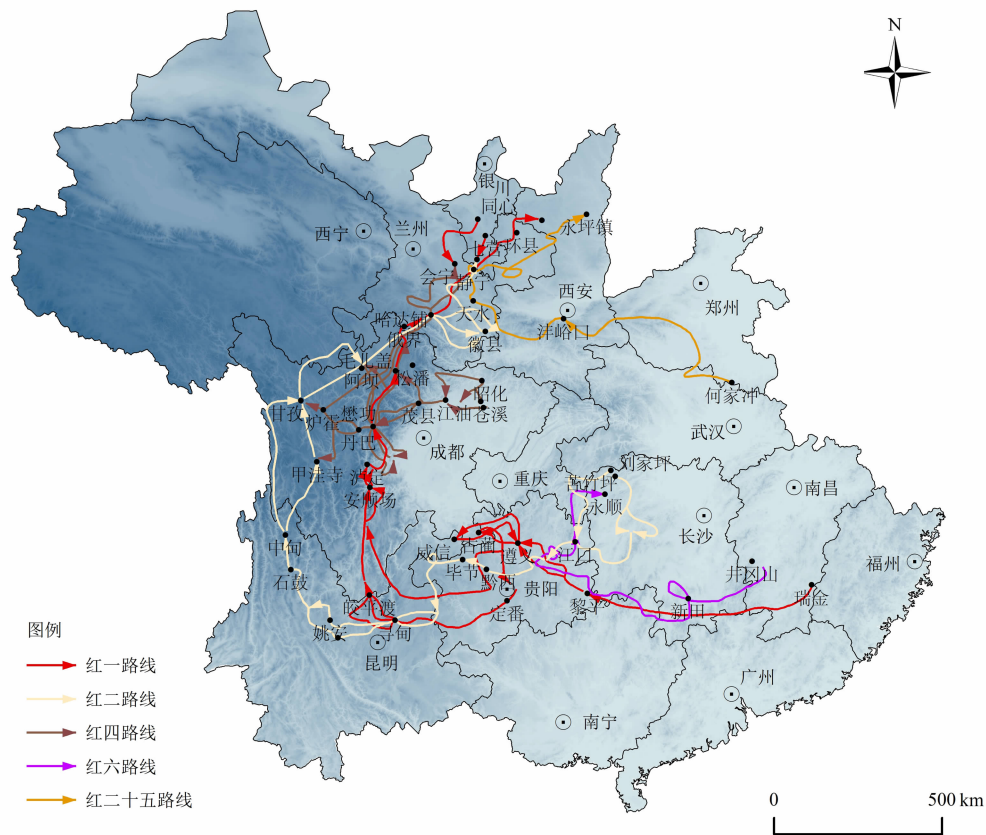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Fig. 1 Route of the Long March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1.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国家文物局(<http://www.ncha.gov.cn/>)公布的1~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长征沿线各省市公布的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通过筛选、甄别、整理,截至2021年底,与长征直接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共计79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0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91处,部分筛选结果如表1

表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长征文物一览表

Tab.1 List of the Long March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批次	编号(第六批起为序号)	分类号(第六批起为编号)	名称	时代	所在地
第一批	20	20	瑞金革命遗址	1931—1934年	江西
第一批	21	21	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	贵州
第一批	22	22	泸定桥	1935年	四川
第三批	33	33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	1932—1935年	四川
第三批	35	35	瓦窑堡革命旧址	1935年	陕西
第四批	234	36	湘赣省委机关旧址	1931—1934年	江西
第四批	235	37	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	1932—1934年	江西
第四批	236	38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	1934年	河南
第四批	237	39	会宁红军会师旧址	1936年	甘肃
第五批	511	38	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	1935—1936年	甘肃
第六批	973	V-100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址	1932—1934年	江西
第六批	974	V-101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	1934年	江西
第六批	1012	V-139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	1934—1935年	湖南
第六批	1028	V-155	湘江战役旧址	1934年	广西
第六批	1041	V-168	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	1933—1934年	四川
第六批	1042	V-169	阿坝红军长征遗迹	1935年	四川
第六批	1046	V-173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	1934年	贵州
第六批	1047	V-174	黎平会议会址	1934年	贵州
第六批	1048	V-175	红军四渡赤水战役旧址	1935年	贵州
第六批	1049	V-176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	1936年	贵州
第六批	1068	V-195	吴旗革命旧址	1935年	陕西
第六批	1069	V-196	保安革命旧址	1936—1937年	陕西
第六批	1073	V-200	俄界会议旧址	1935年	甘肃
第六批	1076	V-203	将台堡革命旧址	1936年	宁夏
第七批	1754	7-1754-5-147	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1934年	福建
第七批	1839	7-1839-5-232	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	1935年	湖南
第七批	1840	7-1840-5-233	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旧址	1935年	湖南
第七批	1868	7-1868-5-261	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	1934年	重庆
第七批	1909	7-1909-5-302	丹桂村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与金沙江皎平渡口	1935年	云南
第七批	1920	7-1920-5-313	南梁陕甘边革命政府旧址	1934—1935年	甘肃
第七批	1921	7-1921-5-314	榜罗镇会议旧址	1935年	甘肃
第八批	622	8-0622-5-106	湖坊中共闽赣省委、省革委、省军区旧址	1933—1935年	江西
第八批	623	8-0623-5-107	井塘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旧址	1934—1935年	江西
第八批	660	8-0660-5-144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指挥部旧址	1934年	湖南
第八批	701	8-0701-5-185	红军长征过石厢子旧址	1935年	四川
第八批	709	8-0709-5-193	猴场会议旧址	1934年	贵州
第八批	710	8-0710-5-194	苟坝会议旧址	1935年	贵州
第八批	730	8-0730-5-214	葛牌镇红25军军部旧址	1935年	陕西
第八批	740	8-0740-5-224	山城堡战役旧址	1936年	甘肃
第八批	743	8-0743-5-227	果洛红军沟	1936年	青海

所示。甄选原则如下:(1)时间范围:1934 年 10 月—1936 年 10 月,即长征开始至三军会师时间。(2)空间范围:长征沿线的 15 个省市区。(3)长征事件:根据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的《长征标识与展示体系建设指引》确定与长征直接相关的出发地、战争遗址遗迹、会议旧址、革命旧址、标语与宣传画、烈士墓、纪念设施等文物保护单位。

空间矢量图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1:400 万地图数据库;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geodata.cn>);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长征沿线各省市《统计年鉴》,并由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利用百度地理坐标拾取系统获取文物保护单位的经纬度坐标,建立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1.3 研究方法

1.3.1 最近邻指数法

最近邻指数是指实际最近邻距离与理论最近邻距离的比值,用于反映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类型^[25]。计算公式如下:

$$\bar{r}_E = \frac{1}{2\sqrt{n/A}} \quad (1)$$

$$\bar{r}_1 = \frac{1}{n} \sum_{i=1}^n r_i \quad (2)$$

$$R = \frac{\bar{r}_1}{\bar{r}_E} \quad (3)$$

式中, R 为最近邻指数; \bar{r}_E 为理论最近邻距离(km); \bar{r}_1 为实际最近邻距离(km); n 为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个数(个); A 为研究区域面积(km²)。

1.3.2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能够清晰地反映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聚集特征^[26]。公式如下:

$$f_n(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4)$$

式中, $f_n(x)$ 为核密度; h 为搜索半径(km); k 为核函数; $(x-x_i)$ 为估计点 x 到样本点 x_i 的距离(km)。

1.3.3 网格维数

以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数反映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均衡性。对区域进行网格划分,考察文物保护单位占据的网格数 $N(r)$, $N(r)$ 随网格尺

度 r 而变化,如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具有无标尺度时,则有^[27]:

$$N(r) \propto r^{-T} \quad (5)$$

式中, $T=D_0$ 为容量维。假定网格统计中文物保护单位数目为 N_{ij} ,全区域分布总数为 N ,可近似地定义概率为 $P_{ij}=N_{ij}/N$, i, j 分别为行号和列号,于是可得网格维数值的函数为:

$$I(r) = - \sum_i^K \sum_j^K P_{ij}(r) \ln P_{ij}(r) \quad (6)$$

式中, $K=1/r$ 为区域各边的分段数目。若文物保护单位体系是分形的,则有:

$$I(r) = I_0 - D_1 \ln r \quad (7)$$

式中, I_0 为常数; D_1 为信息维。网格维数 $D \in (0, 2)$, D 值越大,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越均衡;当 $D \rightarrow 1$ 时,文物保护单位表现出集中到一条地理带(地理线)的趋势。

1.3.4 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采用多因素逐步回归方法识别长征主题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对需要引入的自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仅保留对因变量贡献较大的自变量,并建立最优回归方程^[28]。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Y = b_0 + b_1 X_1 + b_2 X_2 + \dots + b_p X_p + U_i \quad (8)$$

式中, X, Y 分别为自变量和因变量; b_0 为常量; b_1, b_2, \dots, b_p 为偏回归系数; U_i 为残余项。

2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2.1 整体空间分布格局特征

2.1.1 空间分布类型

运用最近邻指数探究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模式,计算结果显示,文物保护单位的平均观测距离为 0.120 Degrees,预期平均距离为 0.269 Degrees,平均最邻近指数 R 为 $0.445 < 1$, Z 得分为 -29.844 ,且在 1%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由此可判断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特征。

2.1.2 空间密度特征

由图 2 可知,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出在局部区域高度聚集的非均质化空间特性,在区域层面上形成了 4 个高密度区和 8 个次密度区,高密度区分别为黔东南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湘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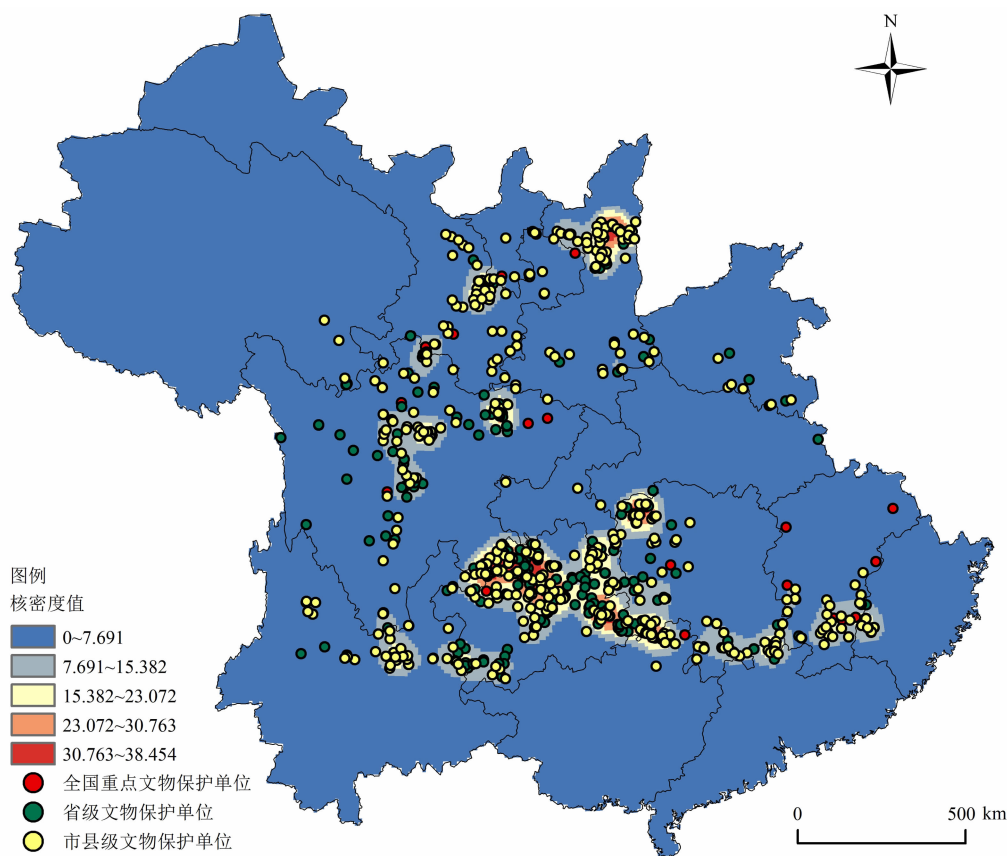


图2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分布

Fig. 2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Long March

区(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川黔地区(遵义市、泸州市)、陕北地区(延安市),其核密度值高达 $30.764 \sim 38.454$ 个/ km^2 。4 个高密度区分别向外辐射,形成了密度值由内向外递减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在其外围均存在 4 个环状次密度区,川黔高密度区向外辐射的次密度区范围包括遵义市、泸州市、贵阳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市、昭通市和宜宾市;其余 4 个次密度区分别为川东地区(广元市)、黔东北地区(铜仁市)、湘南桂北地区(邵阳市、怀化市、桂林市)、陇中地区(白银市、定西市),其核密度值为 $23.073 \sim 30.763$ 个/ km^2 。上述地区红军长征停留时间较长,留下的文化遗存丰富,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相对集中。尤其是贵州作为长征的重要空间节点,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转战至此,成为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高密度分布区。

2.1.3 空间均衡特征

利用 ArcGIS 10.2 的渔网工具对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图进行网格分割,网格 K 值为 $[2, 10]$,根

据式(5)、式(6)计算得出 $N(r)$ 和 $I(r)$ (表 2),并以 $[N(r), K]$ 、 $[I(r), K]$ 分别生成双对数散点图,拟合回归得到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容量维 D_0 和信息维 D_1 数值。

由图 3 可知,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容量维 $D_0 = 1.316$,分形测定系数为 0.986,表明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在一定测算尺度存在宽大的无标度区,在空间上具有显著分形特征,容量维接近于 1,表明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在研究区域内分布不均衡,具有沿着大娄山、夹金山、乌江、赤水、大渡河等地理带状区域集中的趋势。信息维 $D_1 = 0.570$,判定系数为 0.985,其值远小于容量维,既说明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尺度的网格分割中概率变化较大,分形结构比较复杂,也反映出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文物保护单位分形体系存在围绕特定中心展开局部集聚的情况。结合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密度分布图可知,这种集聚主要围绕遵义、张家界、延安、广安、雅安等红军长征停留时间较长、文化遗存丰富的地区展开。

表 2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网格维数测算数据

Tab.2 Grid dimension calculation data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Long March

指标	K								
	2	3	4	5	6	7	8	9	10
$N(r)$	4	7	10	11	16	21	28	28	32
$I(r)$	1.270	1.429	1.813	2.015	2.322	2.619	2.682	2.767	3.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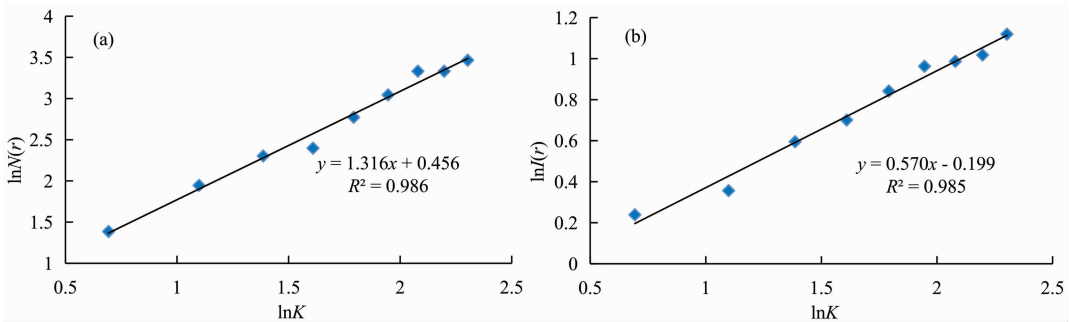


图 3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网格维数双对数散点图:(a)容量维;(b)信息维

Fig.3 Grid dimension double logarithm scatter diagram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Long March;

(a) capacity dimension; (b) information dimension

2.2 不同尺度空间格局特征

2.2.1 省域分布特征

从省域层面上看,由图 4(a)可知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贵州、四川、湖南、陕西、甘肃五省,拥有量分别为 206 个、153 个、104 个、96 个、61 个,占总量的 26.04%、19.34%、13.15%、12.14%、7.71%,其中贵州省拥有量优势突出;福建、江西、河南、湖北、广东、广西、重庆、云南、青海、宁夏 10 个省市市区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比仅为 21.62%,表明各省市区分布数量差距较大。从区域层面上看^①,由图 4(b)可知文物保护单位呈现由西南地区 and 西北地区向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逐渐减少的空间分布特征。

2.2.2 市域分布特征

将研究尺度细化至市级行政区域,统计研究区域 194 个地级市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和密度,结果显示(图 5),126 个地级单元没有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仅占地级单元数 6.18%(排名前十位的地级市)的地级市拥有区域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 52.47%,说明市域尺度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集聚性显著。其中,延安市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位居榜首(9.36%),其次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7.08%)、遵义市(6.95%)、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5.18%)、铜仁市(3.67%)、泸州市(3.16%)。

州市(3.16%)。

2.2.3 地形分布特征

根据研究区域地貌的特点,将高程由低到高分 5 级:<200 m、200~500 m、500~800 m、800~1000 m、>1000 m。将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与 DEM 高程图叠加,统计不同海拔高程范围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和百分比,并拟合回归曲线。从图 6(a)可以看出,各级海拔高度数量依次为 47 个、102 个、124 个、135 个和 383 个,占总量的 5.94%、17.07%、12.90%、15.68%和 48.42%,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 1000 m 以上的高山地区。根据图 6(b)可知,文物保护单位数量随海拔的升高呈不断递增趋势, R^2 为 0.866,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高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交通条件滞后,为长征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有利于红军的战略转移。

2.2.4 流域分布特征

将文物保护单位到河流的距离分为 5 级:<10 km、10~20 km、20~30 km、30~50 km、>50 km,运用 ArcGIS 10.2 软件的缓冲区分析工具,对研究

① 将长征沿线地区划分为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五大区域,华东地区(福建、江西)、华中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华南地区(广西、广东)、西南地区(四川、贵州、重庆、云南)和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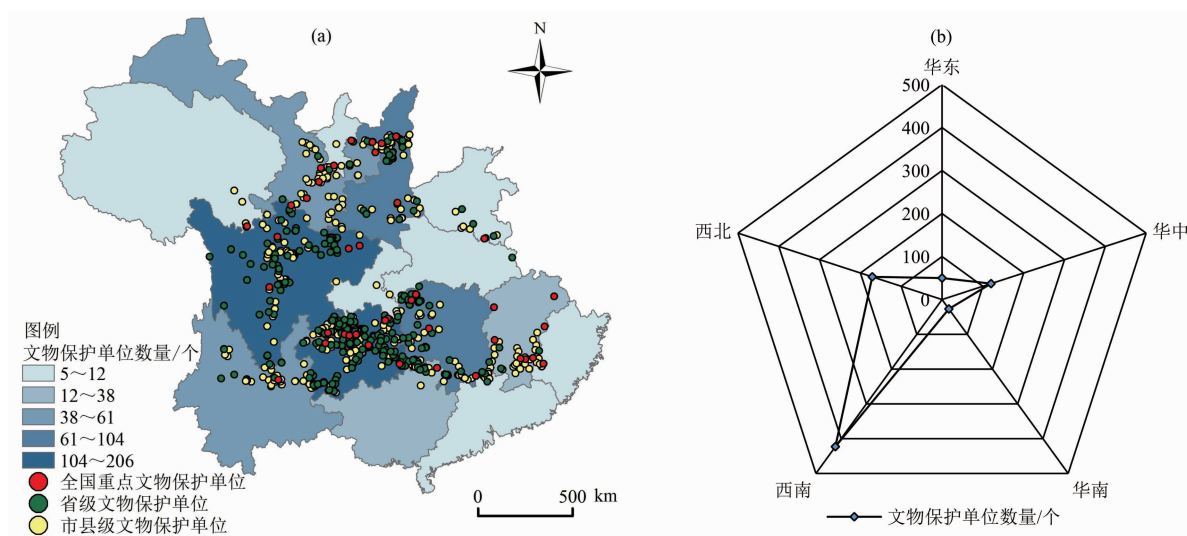


图4 省级尺度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格局:(a)省域分布;(b)区域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Long March:

(a)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b)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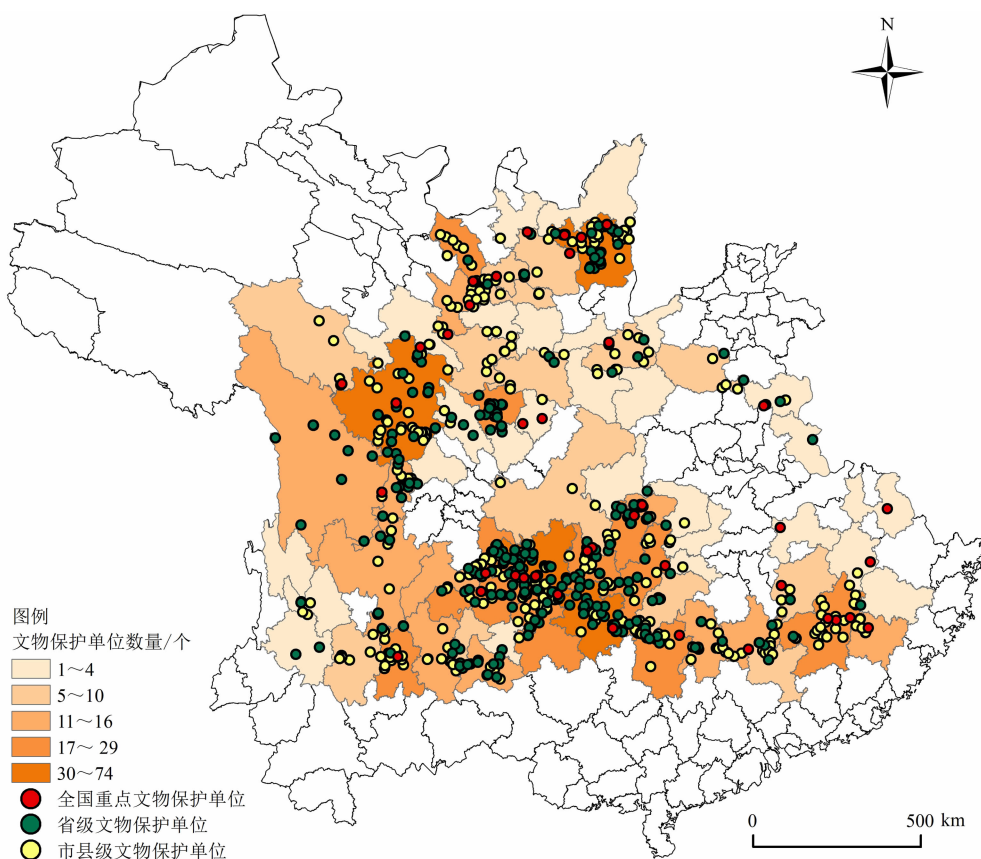


图5 市级尺度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格局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Long March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区域4级以上河流分别进行10 km、20 km、30 km和50 km缓冲区分析(图7a)。各级河流缓冲区范围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依次为251个、179个、115个、143个、103个,占总量的31.73%、22.63%、

14.54%、18.08%、13.02%,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距离河流10 km范围内。由图7(b)可知,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与河流水系的距离远近关系呈递减趋势, R^2 为0.855,表明文化遗产分布具有显著的“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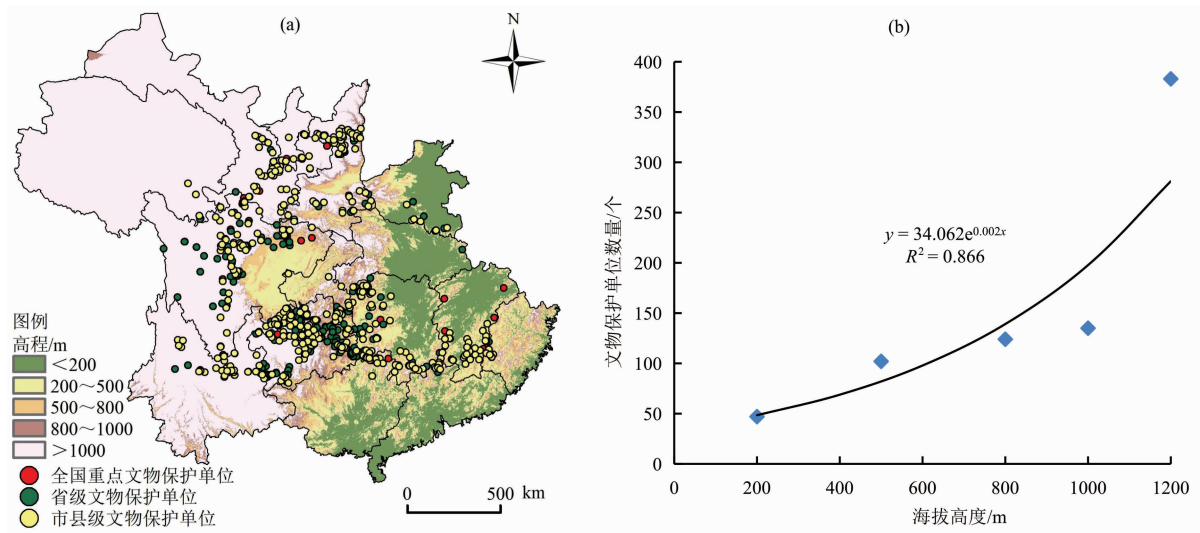


图 6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的地形分布特征:(a)地形分布;(b)拟合曲线

Fig. 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p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Long March:

(a) topographical distribution; (b) fitting cur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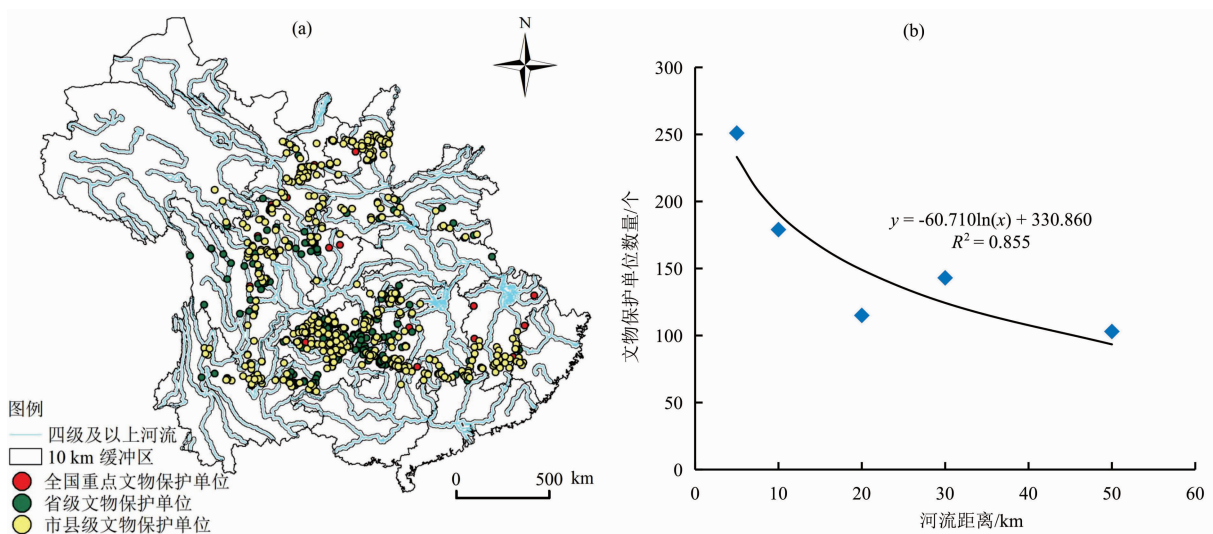


图 7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流域分布特征:(a)流域分布;(b)拟合曲线

Fig. 7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tershed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Long March:

(a) watershed distribution; (b) fitting curve

水”性指向,一方面,研究区域内水系发达、纵横交错,增加了红军转移难度,长征时期著名的战斗战役,如湘江战役、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飞渡金沙江等都与河流有关,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另一方面,河流是红军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

2.2.5 中心城市分布特征

为反映到省会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对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影响,以研究区域省会城市为数据源,将到省会中心城市的距离分为 5 级:<50 km、50~100 km、100~150 km、150~200 km、

>200 km,分别做 50 km、100 km、150 km 和 200 km 缓冲区分析(图 8a),并统计各级缓冲区范围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结果发现,各级缓冲区范围数量依次为 13 个、48 个、132 个、179 个、419 个,占总量的 1.64%、6.07%、16.69%、22.63%、52.97%,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市中心 >200 km 的农村地区。由图 8(b)可知,文物保护单位数量随距离增长呈不断递增态势,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群众基础广泛的革命根据地,掩蔽性强,军阀统治薄弱,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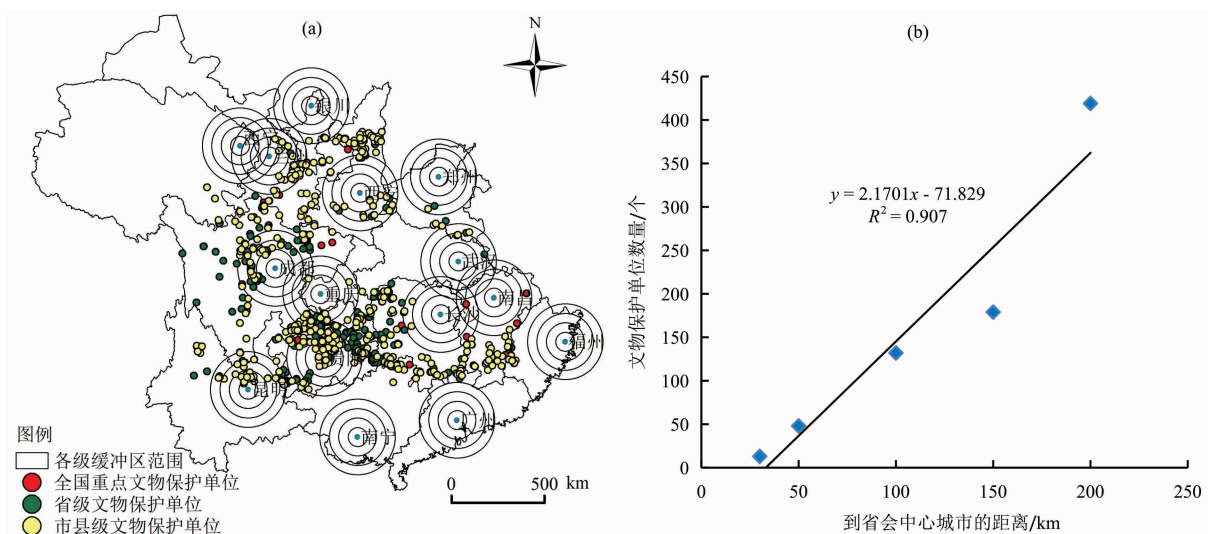


图 8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中心城市分布特征:(a)中心城市分布;(b)拟合曲线

Fig. 8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cities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Long March:

(a)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cities; (b) fitting curve

于红军转移。

3 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3.1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

长征文化遗产是一种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的重要载体,旅游开发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重要方式,能够提高长征文化遗产的自我生存能力,使其摆脱濒危困境。为探究文物保护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现状,将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与 A 级旅游景区名录进行逐一对照,甄选原则为:(1)以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命名的景区,如会宁红军会师旧址、会理会议纪念地等景区;(2)以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展示区的景区,如赤水市丙安古镇将丙安红一军团陈列馆作为核心展示区,最终发现 791 个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仅有 49 个被开发为高质量旅游景区^②,占总量的 6.19%,其中 AAAAA 级景区 1 个,AAAA 级景区 23 个,AAA 级景区 25 个。说明还需进一步挖掘长征文化遗产的内涵,深化长征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加大对长征文化遗产旅游的宣传力度,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参与到长征文化遗产旅游中,推动以长征文化遗产为主体的高质量旅游景区建设,提升长征文化遗产的社

会价值和经济效益。从空间分布上看(图 9),遵义市和延安市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最多,分别为 7 处和 6 处,占高质量景区总数的 26.53%,其次是凉山彝族自治州(3 处)、桂林市(3 处)和赣州市(3 处),其余地级市长征高质量景区数量较少,表明长征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分布不均衡。

3.2 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3.2.1 指标选取

为进一步探究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参考已有相关研究成果^[29-32],结合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实际情况,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可获得性原则,从资源禀赋、市场条件、政策环境 3 个维度,选取长征遗产资源、自然资源、单位面积旅游接待人次、常住人口、GDP、第三产业的比重、交通条件、相关政策、政策支持力度等 9 项指标为自变量,以高质量景区数量为因变量。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在市域尺度对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分异进行定量归因,能够较好地解决共线性问题^[33]。指标的选取和计算方法详见表 3。

(1)长征遗产资源是长征高质量景区开发建设的基础,旅游开发首选便是长征遗产资源丰富的地区,选取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对长征遗产资源进行表征。(2)现代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多与绿色旅游

^② 参考《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定与评定》,将 3A 级及以上景区定义为高质量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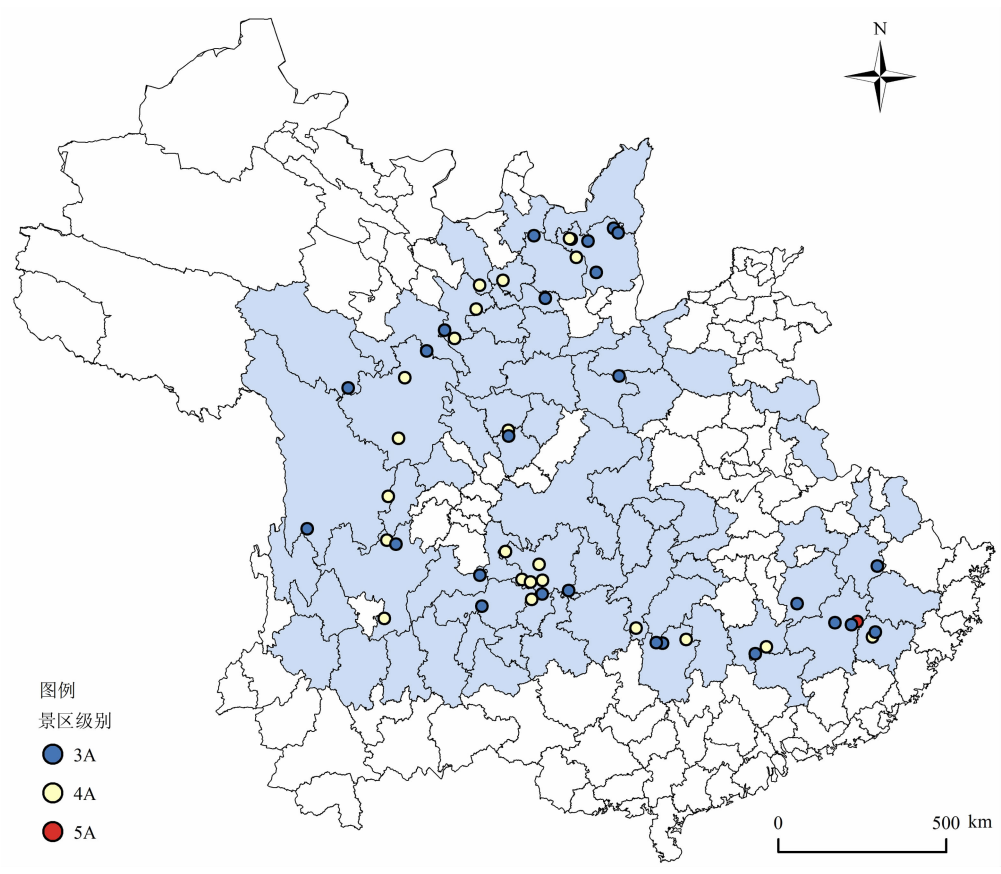


图 9 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quality scenic spots in the Long March

表 3 变量和指标说明

Tab.3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s

维度	自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单位
资源禀赋	长征遗产资源 X_1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个
	自然资源 X_2	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国家森林公园数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国家风景名胜区数量	个
市场条件	单位面积旅游接待人次 X_3	旅游接待人数/市域面积	人/ km^2
	常住人口 X_4	统计年鉴获取	万人
	GDP X_5	统计年鉴获取	亿元
	第三产业的比重 X_6	第三产业产值/GDP	%
	交通条件 X_7	等级公路里程/市域面积	km/km^2
政策环境	相关政策 X_8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及“红色旅游”的次数	次
	政策支持力度 X_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资源相结合,长征沿线自然旅游资源优势突出,为长征文化遗产资源开发、长征高质量景区建设提供了动力与活力,选取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国家森林公园数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国家风景名胜区数量表征自然旅游资源^[29]。(3)旅游市场需求是推动长征文化遗产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选取旅

游接待人次表征地区旅游需求^[29],为了保持研究客观性,排除指标区域面积影响,计算单位面积旅游接待人数^[34]。(4)旅游目的地人口规模是旅游景区的客源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的分布,选择常住人口数量表示区域人口规模^[35]。(5)GDP 代表着地区的整体经济状况,良好的社会

经济基础为长征高质量景区的开发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36]。(6)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产占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旅游业整体发展状况^[35]。(7)交通通达程度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影响着长征高质量景区的分布,选取等级公路里程密度对交通条件进行表征^[34]。(8)长征高质量景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相关研究,以相关政策和政策支持力度两个指标表征政策环境。由于政策的落地以及旅游资源点位的开发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因此以各地级市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及“红色旅游”的次数总和表征相关政策^[25];旅游景区的开发离不开旅游资金投入,借鉴麻学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征政策支持力度^[37]。

3.2.2 多因素逐步回归的结果

基于 SPSS 逐步回归模型进行计算,结果表明,长征文化遗产资源、自然资源、交通条件、相关政策 4 个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和共线性检验(表 4),对长征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R^2 = 0.864$, $F = 128.370$, $P = 0.000$,显示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因而建立的逐步多元回归模型为:

$$Y = 0.136 + 0.059X_1 + 0.028X_2 - 0.252X_7 + 0.266X_8 \quad (9)$$

(1)相关政策。相关政策对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显著正向决定力,回归系数最大,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关政策每优化 1%,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数量增加 26.6%。图 10(a)显示,遵义、延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桂林和庆阳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及“红色旅游”的次数总和高达 13 次、11 次、8 次、6

次、6 次,其余城市提及较少,甚至不提,这与长征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布局较为一致,说明相关政策是推动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红色旅游具有思政性强、投资量大、回报周期长、效益较小等特点,以致多数单纯的社会资本对其涉及较少,因此长征高质量景区的投资打造一般由政府拨款、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建两种形式,没有相关政策支持长征高质量景区难以形成。

(2)长征遗产资源。逐步回归结果显示,长征遗产资源对高质量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长征遗产资源每提高一个单位,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数量增加 5.9%。图 10(b)显示,长征遗产资源富集的区域(延安市、遵义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赣州市、桂林市)亦是高质量景区数量最多的地区,一方面遗产因素是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的基础性力量,是旅游景区开发必不可少的要素;另一方面遗产资源富集区域对旅游业的关注较多,为旅游景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长征高质量景区建设。

(3)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然资源每提高一个单位,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数量增加 2.8%。长征线路穿行于我国中西部自然地貌阶梯转换处,地理环境、景观多样,水体资源丰富,这些自然景观均成为天然的高品质旅游资源,为长征高质量景区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活力。如遵义市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长征遗产资源与山水自然资源相结合,建立旅游合作机制,打造精品线路。图 10(c)亦表明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长征高质量景区的数量较多。

表 4 多因素逐步回归方程结果

Tab.4 Results of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equation

进入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i>t</i>	<i>P</i>	<i>VIF</i>
	<i>B</i>	标准误差				
常量	0.136	0.123		2.248	0.045	
相关政策 X_8	0.266	0.045	0.523	5.940	0.000	1.000
长征遗产资源 X_1	0.059	0.008	0.412	4.676	0.000	1.380
自然资源 X_2	0.028	0.053	0.307	2.616	0.011	1.002
交通条件 X_7	-0.252	-0.233	-0.233	-1.759	0.084	1.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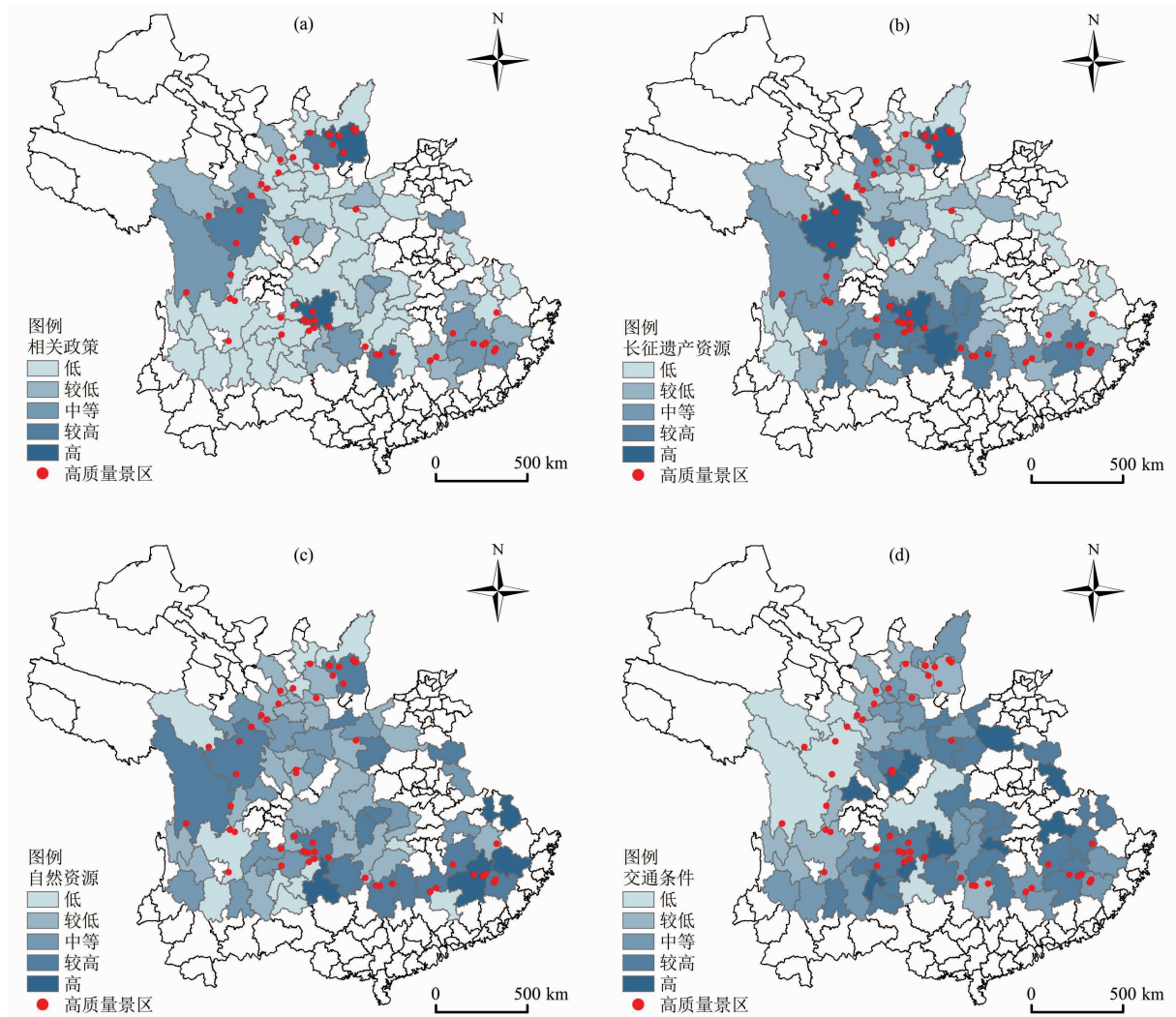


图 10 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叠置分析图：

(a) 相关政策；(b) 长征遗产资源；(c) 自然资源；(d) 交通条件

Fig. 10 Overlapping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Long March:

(a) policy; (b) the Long March heritage resources; (c) natural resources; (d) traffic conditions

(4) 交通条件。逐步回归结果显示,交通条件的回归系数为 -0.252 ,对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图 10(d) 显示,等级公路里程密度较高的贵阳市、南充市、娄底市、黄冈市高质量景区数量较少,而长征高质量景区密集的川西、陕北和陇南地区等级公路里程密度较低。红色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必须依托交通这一连结旅游地与客源地的媒介通道,最大限度地使消费者接近旅游地,扩大红色旅游市场消费潜力。而长征时期形成的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多位于交通设施较落后的县、镇、乡村地区,导致基于其建立起来的 3A 级及以上景区可进入性较差,不利于长征高质量

景区发展,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38]。今后政府应大力推进长征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以长征直接相关的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网格维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合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解析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现状及其空

间分异的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在文物保护单位视角下,长征文化遗产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特征。在空间分布密度上,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形成了4个高密度区和8个次密度区,高密度区分别为黔东南地区、湘西地区、川黔地区、陕北地区,其核密度值高达 $30.764 \sim 38.454$ 个/ km^2 ,围绕高密度区形成了4个环状次密度区,其余4个次密度区分别为川东地区、黔东北地区、湘南桂北地区、陇中地区。长征文化遗产呈现出不平衡分布,具有沿着某些地理带状区域集中的趋势,主要集中于大娄山、夹金山、乌江、赤水、大渡河等地理带。

(2)区域层面上,文物保护单位在西南地区分布最为集中,而在华南和华东地区分布稀疏。省域层面上,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贵州、四川、湖南、陕西和甘肃五省,各省市分布数量差距较大。市域尺度上,仅占地级单元数6.18%的地级市拥有区域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52.47%,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集聚性显著,延安市长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位居榜首。长征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交通条件滞后、国民党统治薄弱的高山地区,以及距离省会中心城市较远、群众基础广泛的农村地区,且具有明显的“亲水”性指向。

(3)目前791个长征文物保护单位仅有49个被开发为高质量旅游景区,遵义市和延安市长征高质量景区最多,其次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桂林市和赣州市,其余地级市长征高质量景区数量较少,表明长征高质量景区的空间分布不平衡。市域尺度上,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长征遗产资源、自然资源、交通条件、相关政策是影响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强作用力因子。

4.2 建议

结合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战略背景,提出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建议:

(1)从整体保护视角来看,应建立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期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开发提供有利参考。其次,各省市区长征文化遗产的分布数量差距较大,应该因地制宜、分区域、分类型制定针对性的保护策略,在长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密集的地区,可依照单体和片区相结合、点线面相串联的保护利用理念,通过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利用;而在长征

文化遗产分布稀疏的地区则要加大对它的保护力度,增加保护资金的投入。

(2)从高质量景区的分布数量来看,应进一步挖掘长征文化遗产的内涵,深化长征旅游资源开发,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景区零星点状分布,政府各自为政,应破除“行政壁垒”,加强跨区域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制定红色旅游协同发展总体规划,打造串联相通的红色旅游精品路线,促进文物活化,协同推动长征高质量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应依托现代市场与科技,开辟更多周边产品,如利用5G、AI、AR、VR、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推出网上虚拟旅游等智能化体验产品。

(3)从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来看,应加快建设旅游交通网络,完善各省区旅游配套设施,提高长征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降低游客出行时间成本;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渠道和方式,创新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在红色旅游发展薄弱的区域,可通过政府干预,给予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旅游投资。长征沿线自然资源、特色资源丰富,注重“红色旅游+”深度融合,形成红色旅游与生态康养游、乡村民俗游、休闲度假游等相结合的产品体系,带动景区产品优化,以产品优化推动高质量旅游景区建设。

本文尚存一些不足之处:(1)对影响长征高质量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因素以探索性分析为主,无法保证枚举因素的全面性,本文所构建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2)对于长征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局限于空间尺度的分析,时间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差异与影响因素并未涉及,今后可从时空二元视角开展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MANSFELD Y, KORMAN T. Between war and peace: Conflict heritage tourism along three Israeli border areas [J]. Tourism Geograph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Space, Place and Environment, 2015, 17(3): 437-460. DOI: 10.1080/14616688.2015.1036916
- [2] LIGHT D. Progress in dark tourism and thanatourism research: An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heritage tourism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1: 275-301. DOI: 10.1016/j.tourman.2017.01.011
- [3] VOUDOURI D. La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Leg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Gree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 Property, 2010, **17** (3): 547 - 568. DOI: 10.1017/S094073911000024X
- [4] VADI V. Crossed destin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ur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5, **18**(1): 51 - 77. DOI: 10.1093/jiel/jgv010
- [5] SHAN Jixiang. Dialectical speculations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spect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10, **60**(237 - 238): 49 - 58. DOI: 10.1111/j.1468 - 0033.2008.00636.x
- [6] 马丽雅. 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的对策思考[J]. 广西社会科学, 2020(7): 151 - 154. [MA Liya.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2020(7): 151 - 154] DOI: 10.3969/j.issn.1004 - 6917.2020.07.025
- [7] 刘建平, 刘向阳. 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探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0**(5): 73 - 76. [LIU Jianping, LIU Xiangyang. Explor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red-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 [J].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30**(5): 73 - 76] DOI: 10.3969/j.issn.1001 - 5981.2006.05.014
- [8] 曹学文. 红色文化遗产及其开发利用研究—以湘潭市为例[D]. 湘潭: 湘潭大学, 2008. [CAO Xuewen. 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search: Take Xiangtan as an example [D]. Xiangtan: Xiangtan University, 2008] DOI: 10.7666/d.d131930
- [9] 韩燕平. 红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以井冈山为例[D]. 湘潭: 湘潭大学, 2008. [HAN Yanping. 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conversation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Jinggangshan Mountain [D]. Xiangtan: Xiangtan University, 2008] DOI: 10.7666/d.d131920
- [10] 卢丽刚, 易修政. 江西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J]. 农业考古, 2010(3): 281 - 284. [LU Ligang, YI Xiuzheng.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Jiangxi [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10(3): 281 - 284]
- [11] 禹玉环. 遵义红色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策略探讨[J]. 兰台世界, 2014(2): 95 - 96. [YU Yuhuan. Discussion on archival protection strategy of Zunyi red cultural heritage [J]. Lantai World, 2014(2): 95 - 96] DOI: 10.16565/j.cnki.1006 - 7744.2014.02.009
- [12] 林子. 红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新路—以贵州省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1): 179 - 183. [LIN Zi.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red army and the new wa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ethnic areas: Taking Guizhou as an example [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8, **39**(1): 179 - 183] DOI: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8.01.039
- [13] 禹玉环. 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探讨—以遵义市为例[J]. 山西档案, 2014(2): 79 - 81. [YU Yuhuan. Protec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Zunyi for example [J]. Shanxi Archives, 2014(2): 79 - 81]
- [14] 刘建平, 曹学文. 基于景观设计学视角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J]. 生态经济(学术版), 2007(2): 419 - 421. [LIU Jianping, CAO Xuewen. Landscape design perspective on the red-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J]. Ecological Economy, 2007(2): 419 - 421] DOI: 10.3969/j.issn.1671 - 4407.2007.10.116
- [15] 邓凌月. 加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立法研究[J]. 理论学刊, 2018(4): 93 - 100. [DENG Lingyue. Study on strengthening local legisla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J]. Theory Journal, 2018(4): 93 - 100] DOI: 10.14110/j.cnki.cn - 37 - 1059/d.2018.04.014
- [16] 卢丽刚, 时玉柱. 红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J]. 菏泽学院学报, 2009, **31**(4): 68 - 71. [LU Ligang, SHI Yuzhu. Digitization protection of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J]. Journal of Heze University, 2009, **31**(4): 68 - 71] DOI: 10.3969/j.issn.1673 - 2103.2009.04.015
- [17] 刘建平, 李双清. 新农村建设中红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地理, 2008, **28**(6): 1049 - 1052. [LIU Jianping, LI Shuangqing. New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red economic analysi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28**(6): 1049 - 1052] DOI: 10.15957/j.cnki.jjdl.2008.06.030
- [18] 彭珊珊. 红军长征湖南段红色文化遗产廊道旅游开发研究[D]. 湘潭: 湘潭大学, 2010. [PENG Shanshan. Study on tourist development in red cultural heritage corridor of the Long March in Hunan part [D]. Xiangtan: Xiangtan University, 2010]
- [19] 禹玉环. 遵义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良性互动研究[J]. 大舞台, 2013(12): 247 - 248. [YU Yuhuan. Study on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Zunyi re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J]. Big Stage, 2013(12): 247 - 248] DOI: 10.15947/j.cnki.dwt.2013.12.032
- [20] 钟思文.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红色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D]. 湘潭: 湘潭大学, 2017. [ZHONG Siwen. Research on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investigation of Hunan peasant movement [D]. Xiangtan: Xiangtan University, 2017]
- [21] 林明水, 鄢沂, 曾春水, 等. 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研究: 文化生态学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7): 1734 - 1748. [LIN Mingshui, YAN Yi, ZENG Chunshui, et al.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7): 1734 - 1748] DOI: 10.31497/zrzyxb.20210708
- [22] 李磊, 陶卓民, 赖志城, 等.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及其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7): 1811 - 1824. [LI Lei, TAO Zhuomin, LAI Zhicheng, et al. Analysis of the internet attention and tourism flow network structure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 Park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 (7): 1811 – 1824 DOI: 10.31497/zrzyxb.20210713
- [23] 林晓敏. 海南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D]. 湘潭: 湘潭大学, 2019. [LIN Xiaomin.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ainan red cultural heritage [D]. Xiangtan: Xiangtan University, 2019] DOI: 10.27426/d.cnki.gxtdu.2019.000822
- [24] 王治涛. 洛阳红色文化遗产的分类和保护[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 (1): 68 – 71. [WANG Zhitao. Class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in Luoyang region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4, **33** (1): 68 – 71] DOI: 10.3969/j.issn.1003-2363.2014.01.013
- [25] 唐承财, 孙孟瑶, 万紫微. 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9, **39** (10): 204 – 213. [TANG Chengcai, SUN Mengyao, WAN Ziwei.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 (10): 204 – 213]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0.025
- [26] 郑光辉, 蒋涤非, 栾永飞,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贵州农业产业空间分异[J]. 山地学报, 2021, **39** (3): 429 – 438. [ZHENG Guanghui, JIANG Difei, LUAN Yongfei,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Guizhou province of China un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J], 2021, **39** (3): 429 – 438]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608
- [27] 陈国磊, 张春燕, 罗静, 等.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 **32** (9): 196 – 202. [CHEN Guolei, ZHANG Chunyan, LUO Jing,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lassical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in China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32** (9): 196 – 202] DOI: 10.13448/j.cnki.jalre.2018.290
- [28] 唐健雄, 马梦瑶. 中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20, **42** (6): 1188 – 1198. [TANG Jianxiong, MA Mengyao.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sites in China [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 (6): 1188 – 1198] DOI: 10.18402/resci.2020.06.15
- [29] 贾珏焱, 胡静, 刘大均, 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 A 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及影响机理[J]. 经济地理, 2019, **39** (1): 198 – 206. [JIA Yaoyan, HU Jing, LIU Dajun, et al. Spati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level scenic spot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 (1): 198 – 206]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1.024
- [30] 卢松, 张小军. 徽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9, **39** (12): 204 – 211. [LU Song, ZHANG Xiaojun.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uizhou area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 (12): 204 – 211]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2.023
- [31] 李莉, 侯国林, 夏四友, 等.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 (3): 683 – 697. [LI Li, HOU Guolin, XIA Siyou,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Chengdu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 (3): 683 – 697] DOI: 10.31497/zrzyxb.20200314
- [32] 李冬花, 张晓瑶, 陆林, 等.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 (5): 70 – 80. [LI Donghua, ZHANG Xiaoyao, LU Lin,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 (5): 70 – 80]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5.008
- [33] 陈云, 吴雨. 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 (9): 152 – 159. [CHEN Yun, WU Yu.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health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 (9): 152 – 159]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9.016
- [34] 龙飞, 刘家明, 朱鹤, 等. 长三角地区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19, **38** (4): 950 – 960. [LONG Fei, LIU Jiaming, ZHU He,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omesta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 (4): 950 – 960] DOI: 10.11821/dlyj020180308
- [35] 刘敏, 郝伟. 山西省国家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学报, 2020, **75** (4): 878 – 888. [LIU Min, HAO Wei.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A-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Shanxi provinc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 (4): 878 – 888] DOI: 10.11821/dlxb202004015
- [36] 王兆峰, 刘庆芳. 产业融合背景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异及形成因素[J]. 地理科学, 2020, **40** (8): 1310 – 1318. [WANG Zhaofeng, LIU Qingfa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ming factors of sports and leisure characteristic tow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 convergence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 (8): 1310 – 1318]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8.010
- [37] 麻学锋, 杨雪.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 (9): 1902 – 1916. [MA Xuefeng, YANG Xu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western Hunan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 (9): 1902 – 1916] DOI: 10.31497/zrzyxb.20190908
- [38] 邹建琴, 明庆忠, 刘安乐, 等.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异质性[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 (11): 2748 – 2762. [ZOU Jianqin, MING Qingzhong, LIU Anle,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lassic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and heterogeneity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 (11): 2748 – 2762] DOI: 10.31497/zrzyxb.2021110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gh-Quality Tourism Development along the Long March

WANG Zhaofeng, LI Qin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areas along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ist of several belt regions in southeastern China, where they are relatively poverty-stricken. Th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to be produced during the heroic undertaking of the Long March can be extensively exploited to develop red tourism,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principal way to enable a strong economic connection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regions,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to revitalize the rural areas.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Long March rarely examine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lacked quantitative comment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igh-quality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Long March. Therefore, it has not facilitated the ful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Long March.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ong March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compared each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of the Long March with the list of A-level scenic spots. A GIS spatial analytical method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of the Long March. The driv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tourist attractions of the Long March were identified using a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he protection units of the Long March cultural relics were clustered in space. The core density areas included southeast Guizhou, western Hunan, Sichuan and Guizhou, and northern Shaanxi,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was concentrated along geographical belt areas, such as Dalou Mountain, Jiajin Mountain, Wujiang River, Chishui River and Dadu River. (2) There was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number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se units were primarily concentrated in Guizhou, Sichuan, Hunan,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at only accounted for 6.18% of the prefecture-level units (the top 1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d 52.47% of the total number of regional long-term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3) Currently, only 49 of 791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were high-quality tourist attractions. On the city scale, the results of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eritage and natural resources, traffic conditions, and related policies of the Long March were the strong forc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igh-quality tourist attractions on the Long March.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to protec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Long March and spatially optimize the high-quality tourist attractions of the Long March.

Key words: the Long March; red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spatial distribution